

# 史语所迁台与 1950—1960 年代台湾的人文学学术建设<sup>\*</sup>

胡 逢 祥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历史系, 上海, 200241)

**摘 要:**当代台湾地区人文学学术的建构,无疑以 1948 年底前中研院史语所的迁台最具开局意义。当此天翻地覆的历史大变局之际,尽管史语所同仁在学术和政治的复杂抉择中心态纠结,却始终坚持以学术为本位的进路,筚路蓝缕,从专业研究、人才培养和学术规范的确立等方面,为台湾现代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的发展奠定了不拔基业。由此写下了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章,给后人以深刻的启示。

**关键词:**史语所;台湾;人文学学术建设;实证史学;考古人类学

随着 1945 年日本战败和台湾光复回归祖国,其地的人文学学术事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建设时期。在此过程中,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迁台及其活动曾起到了至为关键的作用,这在 1950—1960 年代显得尤为突出。故考察和认识该时期台湾地区的学术发展路径,自不能不由此入手。

## 一 史语所之迁台

1948 年秋,内战中满盘皆输的蒋介石集团眼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下,决定撤往台湾暂作栖身,以图后举。为此,他们不仅将大量的金融资财和战略物资秘密运台,还制定了一系列重要军政人员、高级人才和文物图书的撤离计划。11 月 10 日,由行政院长翁文灏出面召集相关人员,密定将故宫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央图书馆和中研院史语所四家机构所藏文物精品、珍贵档案、图书资料和标本仪器等全部装箱,由李济负责押运台湾。同月底,中研院长朱家骅又通过“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员谈话会”,要求各研究所作好迁台准备。但由于当时人们对国民党政权的普遍不满和失望,各研究所对朱的动员大多反映冷淡,唯史语所表现积极。这当中,自然与所长傅斯年的态度有很大关系。

据史语所研究员陈槃回忆:1948 年冬,傅为此召集所内同人会议,伤感地说:“研究所生命,恐遂此告终矣。余之精力既消亡,且宿疾未瘳。余虽欲再将研究所迁至适当地区,使国家学术中心得以维持不坠,然而余竟不克负荷此繁剧矣。今当筹商遣散。虽然如此,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尽其最大努力,妥为介绍安置。”众人听罢,“一时满座情绪,至严肃、悲哀,有热泪为之盈眶者”。傅见状,即谓:“斯年之残生何足惜,当力命以副诸先生之望耳。”遂定迁移之议。在确定迁台后,针对某些人的疑虑,傅还表示:“选择台湾,即准备蹈海,何虑之有!”<sup>①</sup>屈万里也说,国民党政府从大陆撤退前,他曾就中央图书馆内善本搬迁去向征询过傅的意见,得到的回答是:“一定要到台湾去。”当屈担忧“台湾是一个孤岛,孤悬海外,共产党若以兵力断绝交通,围困此岛,将来发生饥饿是很可能的。他说,你不要管这个。”<sup>②</sup>

<sup>\*</sup>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重大项目“六十年来的港台人文思潮研究”(11JJD770008)的阶段性成果。

① 陈槃:《师门纪略》,《涧庄文录》(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638 页。

② 屈万里:《回忆傅先生在台大的往事》,《传记文学》第 28 卷第 1 期,1976 年。

傅之所以坚主迁台,除了其本人与国民党政府存在较密切关系和不赞成中共的“苏俄式共产体制”外,更深层的原因,当与其夙所坚持的自由主义学术立场有关。史语所为其一手创办并寄托此学术理想之地,正是在他的惨淡经营包括与国民党高层的长期周旋之下,才使该所的运作得以勉力贯彻了学术本位和独立的主张,如今眼见“大局崩坏”,自不甘就此任其形销魄散。恰在此时,他接到了教育部长朱家骅招其出任台湾大学校长的邀请。台大系由日据时期的台北帝国大学改制而成,由于当时教育经费奇缺和各种问题丛生,以致光复后短短三年间,走马灯似地换了三位校长,管理上仍未走出困境。于是有人建议请“霸才”傅斯年出山收拾局面。时傅方从美国治病回来不久,身体状况依然堪忧,在一般情况下,本不会接受此职,但知之甚深的台大教授沈刚伯却料其必来,曾对家里人说:“大胖(傅斯年),史语所是他的命,这次走投无路了。”<sup>①</sup>这话,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道出了傅的心事。因为在他看来,史语所既然无法在大陆继续生存,那么迁台几乎是惟一可行的方案,他之出长台大,也可为史语所及其同人的安置争取更多的空间。为此,他当时即致书沈刚伯谓:“弟奉总统命长台湾大学,际此国家艰难(指国民党大陆政权将垮),当勉为之。台大前身学术空气本是欧洲大陆之正统,当尽力保存。以后如因需要增聘教授,必以学术为标准。迁台学术机关如中央研究院等,当以台大之学术进步为出发点而合作,决不为台大累。总之,时事艰难,必须开诚心,布公道,使主客新旧同心相安,然后可图进步。”<sup>②</sup>可见已在考虑史语所与台大的合作事。这一点,从其出长台大后的布局中更可得清晰的印证。

至于史语所其他成员的随迁,则多非由于“政治选边”,而是出自对傅斯年的信任和史语所研究环境的依恋。盖自建所以来,傅氏以其廉洁自律、勇于任事和通达的上层人脉关系,在科研建制、图书设备乃至生活条件方面,为史语所争得了较为安定的研究环境,以至所中同人无不倚之为长城。在这一环境中,他们差不多都养成了与政治保持一定距离和以学术为生命的理念,不愿轻易脱离这一团队乃至所中长期积累的图书文物资料。史语所元老李济和董作宾的情况便颇为典型。李济于 1948 年 12 月奉国民党政府之命负责押运文物去台湾,当时有人劝他勿跟船走,“他说不行,我必须跟着船。押运押运……实际上就是说人在东西就得在。”在他的意识中,“只要是战火,文物都要受损失,牵涉不到爱护哪个政权。”<sup>③</sup>也正因为他不像傅斯年那样政治上和国民党靠得很近,故在赴台后多年,大陆方面仍希望能动员其回来主持国内的考古事业。<sup>④</sup>而其时刚从美国归来的董作宾原拟先撤往西南地区,但当他一听到史语所甲骨即将运台,“就决定不去后方,要随研究院一起去台湾”,<sup>⑤</sup>临行时遇见同乡老友魏辉廷,还私下表示:他是不愿意跟着跑的,只因这批文物他最熟悉,前后经营二十年了,经他手从南京运到重庆,又从重庆运回南京,现在又往台湾运,“责无旁贷呵!自己离不开他们,到那里安排妥当就回来。”<sup>⑥</sup>其他人员的赴台,也多显得十分仓促。如石璋如,当时正在南京养病,临出发前两天才得到消息,连许多私人物品都不及整理,便匆匆赶到上海候船迁台。<sup>⑦</sup>有的因长期沉浸于学术,即使人到了台湾,对已发生的政局变故仍无多少认识,如杨希枚在 1950 年代中期的一次院庆活动中,犹领着众人大唱《开路先锋》、《游击队之歌》、《义勇军进行曲》等革命歌曲,直到有人提醒他:“杨公,这已经是大陆的‘国歌’啦,你怎么还唱这?”才大吃一惊,再三问人:“是吗?”以致后来竟因此种表现被台湾当局确认有“政治问题”,受到不小的精神压力。<sup>⑧</sup>

当然,史语所不愿赴台的,也大有人在。通行的说法是,前中央研究院之迁台仅得一个半所,史语所为其中惟一整体搬迁的单位(还有半个为数学所)。然细一审之,这种说法实包含着相当水分。事实是,史语所的图书文物和设备,固已全部迁台,但从人员看,缺额的比例依然甚高。兹以 1948 年初该所

① 据沈夫人回忆,见杜正胜:《史语所的益友沈刚伯》,《新学术之路》(上),台北:中研院史语所 1998 年,第 427 页。

② 傅斯年致沈刚伯等函电(1948 年 12 月 18 日),王汎森、潘光哲等主编:《傅斯年遗札》卷三,台北:中研院史语所,2011 年,第 1857 页。

③ 据李济之子李光谟回忆,转引自岱峻:《李济传》,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年,第 231、233 页。

④ 据石兴邦《夏鼐先生行传》,1950 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时,他曾对由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兼任所长颇为不解,问夏:“郑先生不搞考古怎么当考古所所长。他说,郑先生是兼任,所长可能是给李济先生留下的。”(《新学术之路》(下),第 722 页)《夏鼐日记》卷五,1957 年 9 月 5 日也有“与刘导生同志谈昨日李光谟同志(李济子)所谈及争取李济老返国事”的记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年,第 325 页)。

⑤⑦ 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 年,第 317 页;第 318 页。

⑥ 见阎东超:《忆董作宾二三事》,政协南阳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南阳文史资料》第 1 辑,1985 年,第 70 页。

⑧ 杨宁荪:《怀念我们的朋友杨希枚先生》,《新学术之路》(下),第 880—881 页。

在岗研究人员为基准,对此略作辨析。

194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岗研究人员情况表<sup>①</sup>

组别	人员姓名	职称	工作情况	备注
第一组 (历史组)	陈寅恪	研究员(组长)	南北朝唐五代史研究	任教清华,兼任组长。未赴台
	傅斯年	研究员(所长)	1947年6月赴美治病,1948年8月归	
	岑仲勉	研究员	唐代及突厥史研究	未赴台
	陈槃	研究员	古代讖纬辑佚及研究	
	劳榘	研究员	汉简及秦汉史研究	
	王崇武	副研	《明实录》校勘及《明史》研究	未赴台
	李光涛	副研	明清内阁大库档案整理及《明清史料》编辑	
	全汉昇	副研	中国经济史研究	
	逯钦立	助研	《全上古三代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编纂及诗史研究	未赴台
	王明	助研	《太平经》考释和道教史研究	未赴台
	王叔岷	助研	诸子研究	
	严耕望	助研	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及唐史研究	
黄彰健	助研	明史研究		
第二组 (语言组)	赵元任	研究员(组长)	汉语方言研究	1938年赴美任教,一直挂名在所,未归
	丁声树	研究员	1944年夏赴美考察研究,1948年9月回国	未赴台
	杨时逢	副研	汉语方言研究	
	董同龢	副研	古代汉语研究	
	周法高	助研	古代汉语研究	
	马学良	助研	保(彝族)文研究及其经典诠释。保文辞典编撰	未赴台
第三组 (考古组)	李济	研究员(组长)	殷墟发掘报告编著(器物部分)和殷墟出土兽骨整理	
	董作宾	研究员	殷墟发掘报告编著(文字部分)和甲骨文之拓、排工作	
	梁思永	研究员	病休	未赴台
	郭宝钧	研究员	汲县山彪镇和浚县辛村发掘报告编著	未赴台
	夏鼐	副研、研究员	第二次西北史地考察报告编著。在傅斯年赴美治病期间代理所务	未赴台
	高去寻	副研	殷墟出土兽骨整理	
	石璋如	编纂	殷墟发掘报告编著(遗址部分)	
	李孝定	助研	以中研院北平图书史料整理处管理员身份,负责接收日伪政府所遗图书	
	张秉权	助理员	整理殷墟甲骨,协编《殷墟文字乙编》	
第四组 (人类学组)	芮逸夫	编纂	川南县棺葬研究	
	石钟	助理员	川南县棺葬及云南民家(爨人)研究	
	杨希枚	助理员	苗族亲属称谓研究	
	于锦绣	助理员	保罗社会研究	赴台后,于1949年2月遭“遣散”, <sup>②</sup> 旋回大陆工作

① 此表主要依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报告(三十六年十月至三十七年二月)》(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三编教育(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97—440页),并参以其他资料编成。表中人员,原则上均为专任人员,特约、兼任或因出国暂不在岗者不列。因按史语所规定,所内在岗人员(专任)都不准在外兼职,唯陈寅恪和赵元任得许例外,虽长期在清华或其他地方任教,却一直保留着组长的位置,故此表予以列入。

② 台北史语所档2—2存有1949年2月1日于锦绣被解聘书,称:“顷奉傅所长面告,台端已在遣散之列,自本年二月份起即停止支薪,兹列台端应得之一月份薪及遣散费,款到请查收。”《李济传》作者岱峻认为这是刚到台时经费紧张,“僧多粥少”的结果(见该书第236页)。考史语所赴台研究人员遭遣散者仅此一例,惟于氏专业水准不弱,回大陆后,自1950年代起先后任职于中央民委参事室、民族出版社和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在彝族研究方面成果不少。以傅氏的一向办事风格看,在一般情况下尚不至因“经济”问题向一研究人员单独“开刀”,其被“遣散”或内有隐情,不能排除这是由于于氏本人要求回大陆谋出路之故(史语所另一研究彝族的马学良其时即留南京未赴台)。志此备考。

以上共计 32 人,其中未赴台 11 人,占 34.3%。从学科分布看,历史组 13 人,未赴台 5 人,占 38.5% (如除去所长傅斯年,则高达 41.7%);语言组 6 人,未赴台 3 人,占 50%。考古组 9 人,未赴台 3 人,占 33.3%;人类学组 4 人,全部赴台,其中 1 人不久即返回大陆。

这些未赴台人员的情况虽不尽相同,但对蒋介石政府的不满则是一致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傅斯年堂侄傅乐焕(因 1948 年未在岗,未列入表中)。他原系史语所副研究员,1947 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期间,出于对国民党政府腐败的愤慨,曾致函在美国治病的傅斯年:“昨间接闻人言,我叔近在美常作演讲协助政府,在美部分左倾学生颇为失望。今日政府之颓局,完全他们自己造成,不值得为之过分劳神也。”<sup>①</sup>坦率地表达了不该继续支持蒋政权的观点。1951 年获博士学位后,遂不顾傅斯年一再要他去台任职的催促,毅然返回大陆。1948 年 8 月赴英访学的王崇武,情况亦与之相似,不同的只是他原来就对傅斯年有看法。1950 年 8 月,当他接到史语所萧纶徽以傅的名义邀其回台湾大学任教的信函,即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话:“阅毕极愤。傅之搬台湾,纯有自私自利为目的,同仁何辜?遭此劫运!回忆两年以前,傅君仗蒋介石势,自北美返国,大放谬词。其时吾极深厌之,与决绝。岂有在其落水后而与同流者乎?因亟复一信以驳之。气愤极深,而措词极硬。复经大改,仍不软。”<sup>②</sup>并退回聘书,于次年 5 月回到北京。而夏鼐和郭宝钧之坚持不走,还与他们胸中藏有中国未来考古事业的蓝图有关,在他们看来,史语所虽迁台,但“我们还有前途,我们留下来还有许多事情要作”。夏鼐还与同事高去寻相约,由高赴台,保护迁台文物的安全,夏则留大陆,继续发展考古事业。<sup>③</sup>至于陈寅恪、丁声树、逯钦立、韩儒林(中央大学教授、史语所兼任研究员,未列入表)等,傅虽想方设法拉他们去台,甚至把丁声树个人的书籍先运到台湾,韩儒林也被学生接到台湾住过一段时间,但他们最后仍选择了留在大陆。

以上可见,史语所经迁台之役,队伍已相当残缺,其中尤以历史、语言两组为甚。

史语所初到台湾的几年,条件极为艰苦。当时台湾虽未经历如大陆地区那样的长期战乱破坏,但短时间内大量国民党军政人员的涌入,都使当地的基本设施不堪重负。史语所人员刚抵台时,无处栖身,只能临时安置在台大医学院的教室,“公家只给一家做了一张方形大床,上头可以搁两张榻榻米,全家人就挤在一起、睡在上头”。不久又转到桃园西南的杨梅镇,租用铁路局的仓库存放图书设备,而在民房办公和住宿。石璋如对当时的窘况有相当真切的回忆:“这个时候我们住得非常狼狈,比如说米仓附近的宿舍,多是楼房,楼下是百姓做生意的地方,楼上让公务员住,另外连堆杂物的号房都租给公家住,像王志维(图书管理人员)就是住号房。有次有个慈善性质的救济团来到这里,预备帮助我们一部分人,还要照相,就有人认为已经很穷了,还要让人拍照,觉得很没有面子了,就反对照相。”<sup>④</sup>由于工作场所局促,连大陆运去的图书资料也无法上架,用时只能从仓库中抬出相关的书籍翻检,往往“找一本书,需要十分钟到半个小时”。<sup>⑤</sup>致使不少工作都难以开展。直到 1954 年底迁至建于南港的新址,才算安定下来。正是在这种一度居无定所的环境中,史语所开始了其在台湾地区从事人文学术建设的艰难跋涉。

## 二 史语所与台湾人文学科的重建

相比大陆地区,日据时期台湾的教育普及水平并不低,但人文学术的建设却相当滞后。期间所设大中专院校的学习科目,基本上是医、农林和工业等实用性专业;而师范类学校的教学内容也多不出音

① 史语所《档案》IV:475,1948 年 4 月 3 日。转引自黄宽重:《写史正壮年——傅乐焕在史语所的日子》,《新学术之路》(下),第 450 页。

② 《王崇武日记》,原件藏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转引自张德信:《王崇武》,见刘启林:《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年,第 478 页。

③⑤ 见石兴邦:《夏鼐先生行传》,张光直:《史语所、李济先生与我》,《新学术之路》(下),第 721 页;第 971 页。

④ 《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第 319—320 页。

乐、美术、劳作、体育、家事等具体教学技能范围。<sup>①</sup>台北帝国大学作为其惟一的综合性大学,虽说其文政学部设有文、史、哲诸科,然其旨在配合日本帝国的“南进”殖民侵略政策作研究,而非发展台湾地区的人文学术事业。台北帝大首任校长幣原坦在该校筹备期间就说:“总督府设置台北帝大的目的,在于利用台湾人文地理条件,发展以台湾为中心的华南及南洋研究。”<sup>②</sup>而一些日本政府官员对于在殖民地兴办人文教育也常怀忧虑,深恐其会推助当地民族情绪与抗日意识的滋长。如日本中央政府法制局长官高桥作卫便向内阁总理大臣大隈重信建议对此加强控制,认为:“土人(指台湾人)已能理解高度之思想,如更授予抽象之教育,助长其提升文明意识,徒促进土人之自觉心,增加不平之念,对设施每生障碍,而造成统治之困难。”<sup>③</sup>出于这样的戒心,文政学部的教研人员始终坚持只聘用日本人。同时,该部文史学科的台生人数也甚少,在长达十七年(1928—1945)的历史中,其史学科招收的62名学生仅3名为台湾当地人,其中毕业二人,均无缘从事本专业研究(另一人至战后方毕业);文学科毕业的台生也仅8名。<sup>④</sup>有研究者认为,此种情况的出现,并非日本当局在招生上对台生有所排拒,而是其就业前景大不如医科或政科等实用性专业,原本就缺乏对台生的吸引力所致。诚然,一般说来,文史专业的就业前景确不如应用性专业宽广,但须看到,整个文政学部前后一共才招生654人(包括大量日籍人在内),年均不到40人(其中还包括了政学科),<sup>⑤</sup>且当时台湾其他高等学校并不开设此类专业,此每年区区数十人的文史专业生,按理并不能满足台湾社会的真实需求,而台生却仍对其就业前景普遍不看好。究其原因,显然与日本殖民当局在文史类专业岗位人员的聘用上刻意防范和排斥台湾人士有相当的关系。诚如台湾考古学家宋文薰所说的:日据时代台湾考古完全控制在日本人的手中,虽然“日本人并未禁止台湾人从事于考古工作,但日本若一直占据下去,这些人一定会没饭吃的。尤其是台湾大学文学院的前身台北帝大的文政学部,绝对不会留用台籍的考古学家任教授的”。<sup>⑥</sup>这种情况不能不对当地人文学术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并由此造成了光复之初大批日本人撤走后,台湾地区无论在教育界还是公私机构的文史专业人才都十分紧缺的状况。

因此,在台湾回归祖国后的“文化光复”年月里,人文学术同样面临着消除殖民地烙印和回归中华的重建与发展使命,而史语所则在其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中坚作用。这一点,尤突出地反映在考古人类学和历史学的建设过程中。兹试分别略作述评。

### (一) 史语所和台湾考古人类学的建设

创建台湾地区的现代考古人类学,并积极推进各项具体实践的展开,可以说是史语所在台最先着手也是成就最为显著的一桩功业。为了在新的条件下规划发展考古事业,李济等人在抵台的第二天,便外出勘察了位于台北的圆山遗址。稍后,复在板桥林氏学田的资助下,组成由台大教授陈绍馨为团长,以史语所李济、董作宾、芮逸夫、石璋如等为主要成员的调查团,展开了一系列田野调查。1949年7、8月,由李济带队到瑞岩(南投县仁爱乡)对泰雅人的体质人类学和民俗学作了实地考察。11月至12月,又组织了大马璘遗址(南投县埔里镇)的考古发掘,发现了石棺、石刀和陶片等史前遗物。

与此同时,经傅斯年和李济等人的积极筹划,1949年8月还在台大成立了以李济为系主任的中国高校首个考古人类学系,<sup>⑦</sup>构筑起系统训练考古人类学专业人才的教育平台。其运作则以李济、董作宾、凌纯声、芮逸夫、石璋如、高去寻、杨希枚(稍后加入)等史语所成员为骨干,开设的课程包括李济的“考古人类学导论”、“史前史”、“体质人类学”和“人体测量入门”,芮逸夫的“民族学”和“中国民族

①⑤ 参见汪知亭:《台湾教育史料新编》,第四章“师范教育”及第六章“高等教育”,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154页。

② [日]幣原坦:《台湾的学术研究》,《台湾时报》1926年12月号,第25页。

③ 吴密察:《从日本殖民地教育学制看台北帝国大学的设立》,《台湾近代史研究》,台北:稻香出版社,1990年,第152—153页。

④ 参见叶碧苓:《台北帝国大学与京城帝国大学史学科之比较(1926—1945)》,《台湾史研究》第16卷第3期,2009年9月。

⑥ 宋文薰:《台湾的考古学》,张炎宪主编:《历史文化与台湾(三):台湾研究研讨会记录(51—75回)》,《台湾风物》杂志社,1991年,第121、127页。

⑦ 在大陆地区的高校中,北京大学于1952年在历史学系设立了考古专业,1983年7月始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考古学系。